

环境社会学研究之三维：环境正义再诠释*

[日] 寺田良一 (著) 程鹏立 (译)**

摘要：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创始人莱利·邓拉普 (Riley Dunlap) 提出了社会学从“人类豁免主义范式”到“新生态范式”的转变，展望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前景。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创始人饭岛伸子 (Nobuko Iijima) 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与物理、生物和化学环境之间关系的社会学领域”。伴随着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环境社会学的这些早期定义已被普遍认可。环境社会学已成为众多社会学分支中的“常态科学”之一，囊括了气候变化、能源转型、自然保护、污染、粮食和农业等在内的各种子问题，以及多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环境社会学的经典定义关注“人类社会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研究并不充分，因为近年来，人类

* 本文为著者在2021年11月于云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后著者对其进行了修改完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青岛理工大学邢一新博士的帮助，特此感谢。

** 寺田良一，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心理社会学科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程鹏立，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等。

社会与环境间的互动不断加深。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研究框架,对环境社会学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的关系进行分类:(1)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2)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3)生物自然环境系统。此外,还有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其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衍生出来,并对上述三个系统产生影响。通过比较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对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生物自然环境系统的影响,笔者试图说明环境正义的重要性。

关键词: 环境社会学 环境正义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LGBT 模型

一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诸如莱利·邓拉普和饭岛伸子等环境社会学创始人开始了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该学科建立半个世纪以来,仍在蓬勃发展,有关环境问题和主题的研究成果可谓卷帙浩繁。这表明环境问题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但似乎也带来了各种环境问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新问题。

邓拉普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该视角基于“新生态范式”(NEP),而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EP)^①。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流行的假设是 HEP,主张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克服生态限制。相反,根据 NEP,尽管技术不断创新,人类社会仍然基本上依赖于环境,只能在地球承载能力的范围内生存。今天,随着气候危机等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与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可能更多的社会学家倾向于接受 NEP 基于 HEP,无论他们的

^① William R. Catton, Jr. and Riley E. Dunlap,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13, No. 1, 1978, pp. 41–49.

研究主题是什么。由于更多社会学家倾向于接受 NEP，我们必须再次反思什么是环境社会学。换句话说，当几乎所有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承认我们的社会必须在地球的生态制约下生存时，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新生态范式。因此，就很难在环境社会学和传统社会学之间划清界限。

除了卡顿和邓拉普强调从 HEP 到 NEP 的范式转换，^① 巴特尔也是环境社会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强调了一套关于社会阶级和分层的传统社会学范式框架的重要性。^② 汉弗莱和巴特尔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学范式，NEP 本身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包括任何关于阶级和权力等社会结构的假设。^③ 他们认为，HEP 或 NEP 应该辅之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关于权力关系的传统冲突范式观点。在环境危机时代，阶级冲突模型和功能主义社会分层模型之间的传统范式差异再次被“问题化”。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阶级冲突和贫困问题似乎已经被解决，不再是资本主义政权的致命威胁，当时我们可以期待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然而，当“增长的极限”^④ 在石油危机和环境污染加剧后变为现实时，社会平等和阶级冲突可能再次成为问题。巴特尔认为，环境极限威胁着 20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合法化的基本机制。换句话说，巴特尔预言，不断恶化的环境负担分配比例失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不公或将导致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灭亡。

饭岛伸子同样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中自然（物理、生物和化学）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经验和/或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的，并侧重于其社会方面”。^⑤ 在 20 世纪

① William R. Catton, Jr. and Riley E. Dunlap,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13, No. 1, 1978, pp. 41-49.

② Frederick H. Buttel,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13, No. 1, 1978, pp. 252-256.

③ Craig Humphrey and Fred Buttel, *Environment, Energy and Society*, Wadsworth, 1982.

④ Donella Meadows, et al., *Limits to Growth*, Chelsea Green, 1972.

⑤ 飯島伸子：《環境社会学のすすめ》，東京：丸善出版，1995 年。

70 年代“环境十年”的早期，“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对简单。工业污染、汽车尾气污染、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破坏了环境，环境恶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条件。社会学的研究问题涉及环境污染发生机制或环境监管措施。饭岛伸子对工业污染受害者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关注健康损害或经济损失，还关注社会排斥，如对受害者的偏见和歧视。她还关注了导致和加剧污染的政治结构。她将该分析框架称为“加害和受害结构”，该框架描述了污染企业、政治支持团体、受影响人群之间的因果关系。^①

即使饭岛伸子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学术语中，自然本身也不被认为是行为主体。将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对象的说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之间进行了谈判。相反，冲突总是发生在受益于环境开发的社会行动者和受害于环境开发的社会行动者之间。饭岛伸子合理地将两个典型的社会团体分类，即污染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像水俣镇渔村居民这样的污染受害者往往不仅受到健康问题和经济困难的影响，而且受到当地社区偏见和精神压力的影响。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工业化时代，大多数地方政客和政府官僚支持污染工业，地方执政党总体上被认为是“加害结构”。因此，环境问题的实际冲突通常表现为反污染运动和亲工业政党之间的冲突。

当然，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值得充分认可。然而大致看来，环境社会学的早期定义，即“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有其历史局限性，这一局限性受制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背景。^② 相较于半个世纪前首个“地球日”举行时面临的环境问题，我们在 21 世

① Nobuko Iijima, *Social Structure of Pollution Victims*, in J. Ui, eds., *Industry Pollution in Japan*,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4 - 172.

② 译者注：有关经典环境社会学定义中“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的争论，陈阿江教授有具体深入的阐述。参见陈阿江《环境社会学体系之构建：社会问题的视角》，《环境社会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

纪 20 年代所观察到的环境问题发生了一些显著的结构变化。毋庸置疑，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显著增强。20 世纪 70 年代，严重的工业污染、环境退化和空气污染只发生在少数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而今天环境退化几乎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地球不仅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威胁，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而且生态系统，包括作为内部生态系统的人类有机体，也受到了持久性化学污染物质的破坏。

如果更仔细地审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的环境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大致从破坏生态系统微妙平衡的污染（如“寂静的春天”问题）转变为宏观资源稀缺（如“增长的极限”问题）。换句话说，早期的问题主要涉及污染物或合成化学物质的负向影响，这些污染物或合成化学物质影响了自然生态系统或生物体的正常功能，而后者则涉及大规模能源消耗或全球变暖等全球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前者可以被描述为“生物自然环境”破坏和由之引起的健康问题，而后者可以被描述为“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承载能力过载。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两个问题在今天几乎同等重要。然而，气候变化等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威胁似乎比转基因生物（GMOs）和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EDCs）等生物自然环境威胁更为明显。

本文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个目标是绘制一张分析图，描述人类社会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目标是使用如图 3 中的三维，分析和重新解释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关系不仅是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两种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系统的传统社区或社会和后来衍生的技术和工业社会。受工业污染影响的社区，或饭岛伸子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关系模型，是冲突的典型例子。受影响的社区不仅包括田园诗般的农村社区，还包括现代城市居住社区，在那里，人们依靠健康的环境养育后代。第三个目标是，重新解释与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问题）相比，为什么

生态系统和后续健康问题的受破坏程度较低, 或者我们的身体作为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受破坏程度较低。

二 环境问题的三维图

图 1 和图 2 来自邓拉普和乔根森的著作。在图 1、图 2 中, 邓拉普和乔根森试图说明 20 世纪 90 年代和当前生态僵局严重程度的比较。20 世纪 90 年代, 三种相互竞争的生态功能: 供应站、居住地、废物库之间即使已经存在冲突, 但它们并未超过当时全球整体承载能力的极限。然而, 在 21 世纪的今天, 人类对供应站和废物库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全球的承载能力。邓拉普和乔根森认为, 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气候变化等负面环境影响, 而且造成了北方和南方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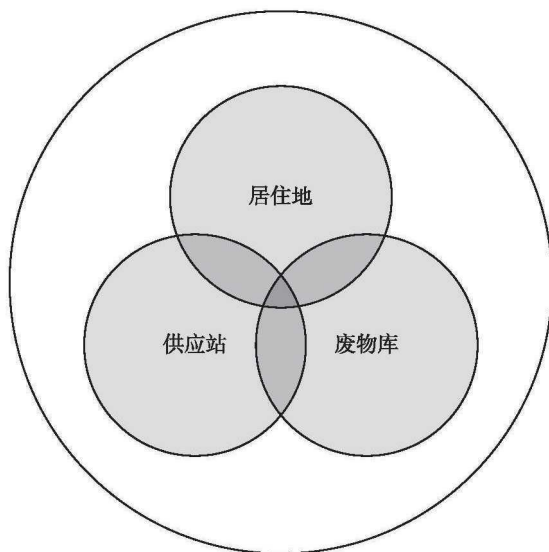


图 1 环境的竞争功能 (20 世纪 90 年代)

说明: 最大圈区域象征全球承载能力。

资料来源: Riley E. Dunlap and Andrew K. Jorgens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Ritzer, G. (ed.),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Blackwell,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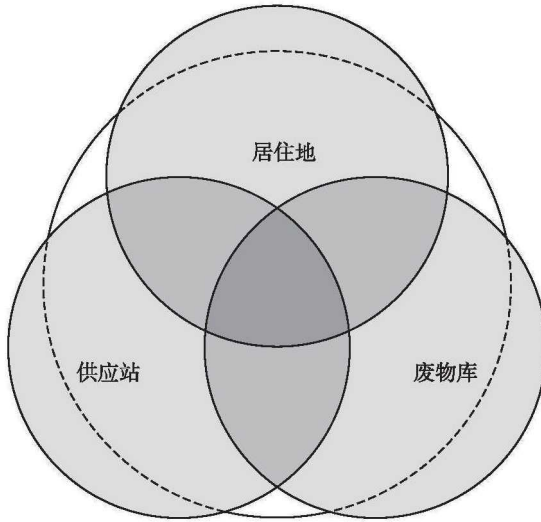


图2 环境的竞争功能（当前情况）

说明：最大圈外的区域象征人类社会生态超出全球承载能力。

资料来源：Riley E. Dunlap and Andrew K. Jorgens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Ritzer, G. (ed.),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Blackwell, 2012.

之间或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之间环境负担的分配不均。例如，针对本国危险废弃物倾倒地建设用地的稀缺问题，发达国家将目标对准了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废物库。

邓拉普和乔根森考虑到了当地和全球承载能力的限制，描述了当今人类社会生态过载的一些关键方面。但是，需要添加一些修改。首先，他们提出的三种生态功能——供应站、居住地、废物库，是人类生计的主要功能。例如，即使不断扩大的人类生存空间威胁到承载能力极限内野生物种的生存空间，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这些现象也可能不会在本模型中得到认真考虑。如果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基因突变的新物种可能会溢出到正常环境中，破坏自然动植物种群。要评估诸如现代农业中转基因生物使用量的增加对人类的影响，就必须考虑维持生物生态系统平衡的质性方面，而不是数量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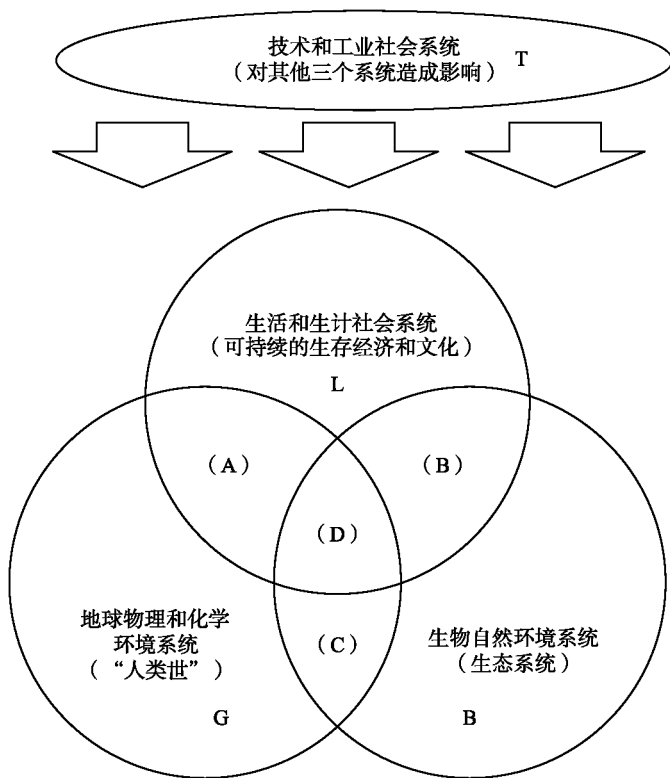
其次，它假设了一个人类社会开发利用生态系统的单一模型。在像

美国这样的“新世界”，除了被驱逐的原住民，现代工业社会从一开始就利用和开发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在“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普遍依赖于当地的生态系统，直到工业化发生。即使是在今天，大多数“旧世界”社会都有广阔的乡土社区，基本依赖于生态可持续农业和林业。尽管自给自足生产在西欧和东北亚等工业化“旧世界”的 GDP 中只占有限的比例，但它仍在实践，并将与工业化和资本化农业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邓拉普和乔根森的“掠夺型的工业社会”的单一模型是非常独特的，应该提出维持生存和工业化社会系统的双层模型。

图 3 代表了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三维模型，以分析当今环境问题的新特征。

我们应当考虑，在化石燃料催化现代技术发展之前，人类社会是如何生存或适应周围多样生态系统的。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人类社会适应特定生态系统的各种模式，也并非详细讨论他们如何发展农业和运用其他办法来生产食物、建造居所以求得生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除非人类社会继续与周围的生态系统共存，否则任何人类社会都无法继续生存。“文化”（culture）一词起源于“cultivation”，意指耕种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因此每个存续下来的社会都有自己的方式来适应自然环境，以免对其造成严重破坏并维持生存。在特定的生态条件下，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当地人，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比如饮食习惯和房屋建设风格。换句话说，他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具体特征深深地渗透到了其生计技艺、文化，甚至居民的身体和基因特征中。正如东亚传统（有机）农民常说的“身体和土壤是不可分割的（身土不二）”，当地生态系统、粮食和农业传统以及人类有机体（或内部生态系统）的具体特征已经相互融合。

因此，人类社会和社区，尤其是工业化前的社会和社区，不太可能故意超过它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由于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每个现存的人类社会都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与环境共存，我们更应



说明：“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影响造成的环境问题如下：
 (A) 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有毒废物；
 (B) 生物多样性丧失、转基因生物、森林被砍伐、物种灭绝；
 (C) 荒漠化、农药应用；
 (D) 气候危机、污染受害者、环境正义。
 四个系统的首字母缩写构成了LGBT模型。

图3 人类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LGBT 模型)

该假设社会的双层结构。如图3所示，在底层，笔者假设基本的可持续“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它确保了人类生活和生计的根本基础。

这些基本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周围的“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生物自然环境系统”或狭义的“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以及其他两个环境系统总体上是相互协调的。然而，后来又出现了非常强大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即“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主要产生于工业化之后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的驱动力是从其他三个领域实

现利润最大化,即剥削劳动力、开采化石燃料、开采矿石、将各种自然资源商品化,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将所有这些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与和谐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相反,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通常对环境不友好。

虽然笔者在“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的圆圈上方单独画了一个椭圆形,代表“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系统在地理上是分开的。相反,一般而言,两个系统存在于同一个地理区域,同一个人许多情况下同时属于这两个系统。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更多的空间和人员被卷入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而发展中国家的更多空间和人员则被卷入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中的生存性生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两个系统位于同一地区,但“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却利用了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的基本生存领域。

三 L、G、B 和 T 系统内的相互作用

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和生计、地球物理和化学以及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一直是共存的关系。现代技术依靠利用化石能源来维系,而对于没有现代化技术的社区来说,滋养自然以确保人类可持续生存至关重要。

然而,当我们审视古代主要文明的兴衰时,我们发现,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了诸如荒漠化、森林砍伐、盐碱化等环境破坏问题。这是由于当时相互竞争的古代城邦开发农业并强行扩张农田造成的。除了这些极端情况外,大多数人类社会都与环境共存。在图 3 中,(A)、(B)、(C)和(D)是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之间的重叠区域。在此区域内,人类在资源再生和生物降解极限内维持生存或处置生产生活废弃物。只要人类社会与环境的交换在两个周围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的极限内继续下去,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就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然而，人类活动的足迹已遍布地球，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和重塑了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此外，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尤其在两个环境领域引起了大规模的根本性变革。最重要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对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极大地破坏了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这种情况被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博士命名为“人类世”。

工业化后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对这三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几乎不必谈论现存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遭受了多大损失。随着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的出现，现存的经济体系中的主要部分已经转变为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如前所述，在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之间的重叠区域（A）和（D），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污染受害者痛苦不堪，并导致二氧化碳增多和气候变化。

在（B）和（D）区域，即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之间，工业发展破坏了生计经济或自给经济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此外，为了获得短期经济效益，可持续农业已经转变为机械化化学农业，导致土壤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受损。人们遭受了有毒农药、森林砍伐、荒漠化、物种灭绝、自然灾害等的损害。当前，转基因生物（GMOs）的迅速扩散加速了传统作物物种间遗传信息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C）和（D）区域，即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环境继续恶化，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积累和荒漠化。

重叠区域的环境污染不是由相邻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造成的，而是由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的影响造成的，这些系统是最近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衍生出来的。还要注意的，这两个对生态环境作用方向完全相反的社会系统在特定社会的同一地理边界内并存，有时在更大的区域内并存。因此，环境冲突不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社会或地区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之间。环境冲突不会发生在人与森林或农田之间。环境冲突,只要是社会冲突,就只能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团体之间,而不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简言之,环境冲突是关于共生或掠夺的竞争或对立的关系。

如果试图破坏环境的技术工业部门是由跨国公司组成的,那么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之间的环境冲突往往与北方和南方的环境冲突并存。如果这些冲突跨越不同的种族或族裔群体,则可归类为“环境正义”运动。

四 对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 环境系统的认识差异

如果我们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试着选出一些在环境问题上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很多人都会想起《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封闭的循环》的作者巴里·康芒纳,以及“爱河事件”中反对有毒废料倾倒的一位名叫洛伊斯·吉布斯母亲。在激进的草根环境运动开始时,标志性的环境问题是杀虫剂和其他有毒化学品的使用,它们破坏了自然环境和人类有机体中生态系统的微妙平衡。康芒纳的“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与“没有免费的午餐”等说法成了有力的反证,驳斥了技术中心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包括环境僵局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来解决。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认为,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技术开发找到解决方案。这可能适用于机械系统,但并不总是适用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例如,当化学品制造商试图通过在田间喷洒杀虫剂来杀死有害昆虫时,他们同时杀死了有害昆虫和有益昆虫。因此,该区域失去了一个平衡健康的昆虫群,而这个昆虫群能够抵御新的有害昆虫。并且,由于缺乏捕食性昆虫,该区域更易遭受虫害。当然,除此之外,杀虫剂也对人类和其他动物有害。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年代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吸引了许多环保人士的注意。

像卡逊和康芒纳这样的生态吹哨人也对 DDT 等合成有毒化学品的持续存在提出了警告。DDT、多氯联苯和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不可实现生物降解，几乎永远留在环境中。它们通过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在生物体中积累，而我们人类恰恰位于食物链的顶端。此外，除了致癌性和神经毒性等常规毒性外，科尔伯恩等人还检测到了内分泌干扰物等新毒性。^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稍晚的时候，能源短缺、石油危机、化石燃料枯竭、酸雨、森林砍伐、荒漠化和全球变暖变得更加棘手。与精致的生物自然环境系统的微观平衡不同，全球环境的巨大转变开始出现。这些全球环境问题远比微妙的生态平衡与和谐更加突出和具体。石油枯竭年的预测可以根据年消耗量和总储量来计算。此外，我们可以根据不断上升的二氧化碳水平来预测温度的上升情况。

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破坏比生物自然环境退化更严重或更危险。笔者认为，这两个领域中，环境破坏的发生机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机制存在根本差异。虽然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或无机球体的变化相对可计算和预测，但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中的环境灾难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可能被低估了。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目前所有的有机体未遭受 DDT 或核电站事故产生的人工放射性物质等合成有毒化学物质的侵害，因此科学家掌握的精确计算线索较少。

另外，气候变化作为地球物理异常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主要解释为二氧化碳过度排放的结果，尽管有人坚决反对。如本文所示，在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中，一种元素导致另一种现象的许多机制通常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然而，在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中，包括我们的身体有机体，因果关系非常复杂和多样。每个元素和功能都像齿轮和齿轮装置

^① Theo Colborn, Dianne Dumanoski and John Peterson Myers, *Our Stolen Future: Are We Threatening Our Fertility, Intelligence and Survival? A Scientific Detective Story*, New York: Dutton, 1996.

一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仅仅一个齿轮断裂就可能会导致整个有机系统的故障。由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当一个现存的有机体暴露于内分泌干扰物等全新的有毒化学物质中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认为许多科学家和决策者会低估有毒化学物质带来的未知风险。

根据笔者 2017 年在日本对风险感知的调查研究,受访者认为“转基因生物的健康风险”(51.2%)和“电/磁场的健康风险”(45.1%)是“尚未得到科学证明的健康风险”,而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威胁的数据则是“汽车废气”占 11.8%、“全球变暖”占 14.0%。^①

因此,与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的环境威胁相比,生物自然环境系统的威胁,尤其是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风险,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或得到的是相对乐观的估计。反过来,对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的威胁的认识差异,进而导致诸如 1997 年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1987 年关于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国际协定的数量的增加和重要性的增强。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样的国际机构在达成协议以立即采取共同措施应对全球物理灾难方面难度较小,因为我们看到,在 1987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之后,所有破坏臭氧层的化学品,如氟氯化碳,几乎都被完全禁止。

相反,尽管在 20 世纪末左右缔结了许多关于减少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的风险的国际公约,但它们似乎没有《蒙特利尔议定书》那样有效。《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 年缔结)、《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1998 年缔结)、《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 年缔结)是三项具有代表性的公约,旨在减少有毒化学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长期环境和健康风险。然而,逐步淘汰这些化学品的监管政策不如减少和禁止对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的威胁,

① Ryoichi Terada,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Nuclear Disaster and Its Socioeconomic Status Back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isk Democracy’,” *Meiji Asian Studies*, Vol. 1, 2019.

如二氧化碳和氟氯化碳监管政策的成功。

虽然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的灾难都是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的影响带来的，但它们在两种情况下有所不同。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前者的因果关系比后者更容易被证明。其次，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危机在更短的时间内严重威胁着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一方面，有毒化学品产生的生物或生态危机需要更长的时间，直到它们最终完全摧毁这两个领域。即使一些科学家仍在试图反驳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但非专业人士实际上已经受到夏季异常高温或超级台风和飓风的威胁。

另一方面，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的风险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明显影响人类生殖器官。此外，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可以从富裕地区转移到贫穷地区，以便北方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规避风险。这就是环境（不）正义问题的本质。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那些受益于有毒化学品的人（如跨国化学品制造商）和那些刚刚遭受这些化学品影响的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

五 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重新整理邓拉普和乔根森与饭岛伸子提出的两个开创性分析框架。他们都密切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然而，环境本身并不是可以直接与人类互动的主体。因此，环境社会学家需要重新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其转化为经常发生冲突的社会各方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通过图3解释两个层次的人类社会系统与两个不同环境系统的关系，即图3中的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

如图1和图2所示，邓拉普和乔根森提出了生态系统的三重功能：供应站、居住地和废物库，因此环境问题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过度使用

这些功能,使之超出了全球承载能力的极限。他们还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当废物处置等负担超过一个地方的处置能力并被转移到另一个有空间(较穷)的地方时,就会发生环境不正义问题,或环境负担的不均衡分配。

他们极具敏锐的洞察力,但他们的框架假设了一个单一的社会模型。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对环境有害。有必要建立环境社会学框架,使我们能够分析社会或地区的哪些部分超出了承载能力,还有哪些社会或地区不得承受这些负担。前者是北方、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及城市化地区,而后者则是南方、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及农村社区。

同样,环境冲突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社会内部之间的关系。正如饭岛伸子将其描绘成工业污染时代“加害”的企业和官僚部门与“受害”的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假设人类社会两个不同的子系统:追求生产力与利润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以及主要关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与维持生存手段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迅速发展,几乎吞噬了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不仅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不一致,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另外两个环境系统: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

笔者认为,尽管人类社会,特别是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影响了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环境系统,但这两个系统的监管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在这些影响中,一系列国际公约有效地处理了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的影响,如臭氧层消耗和气候变化。这是由于可预估的灾难性后果使得有关各方就国际监管准则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此外,受益于农药生产的跨国化工公司与担心农药健康风险的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导致他们对生物自然环境系统的影响更难以达成共识。尽管各国政府都同意,必须通过《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国际公约来消除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并以此作为官方立场，但它们有时在采取有效措施禁止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犹豫不决。

笔者无意低估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共识的重要性。有关各方确实为克服障碍做出了巨大努力，比如和“气候变化否认论”的斗争，以及与化石燃料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然而，在减轻对生物自然环境领域的影响方面存在着更大的障碍，这不仅是因为商业部门与生活生计社会系统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还因为很难从科学上证明内分泌干扰物、持久性（永久性）有毒化学品、生物累积化学品等带来的健康和环境风险问题。此外，这些有毒物质来自农药、洗涤剂、阻燃剂和塑料添加剂，这些有毒物质已经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在当今世界各地造成了各种环境（不）正义事件。

笔者再次强调，通过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三维图，我们应该认识到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之间相互冲突的社会内部互动对于环境社会学的分析至关重要。这些冲突与实现环境正义的各种努力并存，或清楚地反映在这些努力中。

Table of Content & Abstract

Theoretical Research

Recategorizing Three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ical Studies
and Perspectives: Toward Reinterpret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Ryoichi Terada (write) Cheng Pengli (translate) / 1

Abstract: Riley Dunlap, the founder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U. S. , proposed a paradigm shift in sociology from “human exemptional paradigm” to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in the late 1970s prospecting the adv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Nobuko Iijima, the founder in Japan, defined it as “a field of sociology tha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he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1990s. These early definition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as ser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became obvious everywher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normal sciences” among hyphenated sociologies, including varieties of sub-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energy transition, nature conservation, pollu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and so

on, as well as numbers of methods and analytical concepts.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sometimes does not suffice because of the deepening interpenetration of them recently.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a draft of diagram that categoriz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ree major research field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1) the life and livelihood social systems; (2) the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nvironment; (3) the biologic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 addition to these three systems, th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social systems that have been derived from life/livelihood systems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giving impact on above three systems. Comparing the impact on the geophysical/geochemical systems and that on the bio/ecological systems, I will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Social Systems; the Life and Livelihood Social Systems; LGBT Model

The “Chinese Era”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hen Zhanjiang Zhao Xianggang / 18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research on lo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hi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s emerged as a branch of Chinese sociology with unique values and research interests after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awakening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China’s academic community will further develop academic character and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hi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ill usher in a “Chinese era” which is rooted in its own civilization